



我们为什么爱读汪曾祺

□徐则臣

海明威在《午后之死》中写道：“冰山运动之所以雄伟壮观，是因为他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。”对一个作家的创作来说也如此，他在作品里面呈现出来的可能仅仅是这个人的八分之一，他背后的写作资源、精神谱系十分复杂。我在梳理汪曾祺先生创作的时候，就发现像进入了一个迷宫。

汪曾祺的创作受到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影响，西方的现代主义、佛教和老庄哲学对他的影响非常大，他对文学与时代关系的思考也很深入。很多人认为，汪曾祺跟时代之间的关系比较淡薄，甚至扯不上关系。他的确不是那种跟现实亦步亦趋、与时俱进的作家，但绝非无视和游离，他跟时代之间的关系是另外一种。

《受戒》这样的作品，汪曾祺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写出来？它跟同时代的作品区别显著，当然汪曾祺的出现，也跟那个时代的其他作家迥然不同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一直到90年代，这十来年年是汪曾祺先生小说创作的高峰时段。那个时期流行的是伤痕文学、寻根文学、先锋文学，尤其是后来的先锋派，以决绝的、高蹈的乃至游戏的创作姿态，去反拨此前文学跟现实之间零距离的关系。文学风潮有极大的裹挟性，它会形成一种意识形态，影响我们对文学的判断，所以很多作家没能力逆流而动，也没勇气改弦更张。而汪曾祺先生这时候选择了逆流而上，或者说根本不是逆流，他只是顺流而下，顺着自己与众不同的想法之流来写，所以创作出了这些“另类”的作品。

《受戒》的故事不复杂。小说开始就详细地对寺庙和尚的情况做了一个梳理，描写都非常生活化。理解汪曾祺的作品，不能用一些奇崛的小说作法的清规戒律进入，你要贴着生活去理解，这也是汪曾祺作品里最重要的价值之一，就是还原生活本身、体贴生活本身、认同生活本身。这就是汪氏小说跟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。《受戒》中明海和小英子的对话，两个少男少女，用十分真诚、干净的声音告白的时候，你会觉得特别有意思，动人，这个小说今天读来依旧深入人心，就是因为《受戒》写的是我们日常的生活。汪曾祺格外理解、包容他笔下的人物，他没有刻意抬高，也没有过度传奇化，他不把小说写成生活的对立面、对手或者敌人。他只是忠实地写出自己对生活的感觉。

汪曾祺对自己的散文化写作有十分清醒的认知。他认为自己散文化写作的最大诉求是和谐，他不喜欢刻意的、严格的布局结构，主张信马由缰，写到哪儿算哪儿。散文化的小说，往往没有非常起伏的、戏剧化的、有冲突的故事，靠什么吸引读者？靠的是韵味、格调、格局，靠的是作品背后的作家的人格力量，靠的是作家这个人语言的修为。这也是沈从文和汪曾祺这类作家厉害的地方，他们不作传统意义上的曲折故事，但依然能让读者沉醉其中。

回到刚才那个问题，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出现《受戒》？彼时汪曾祺年近六旬，这个年龄绝大多数作家的创造力都在走下坡路，但先生逆势上扬，简直是一飞冲天。他在创作谈里陈述了三个原因：第一，写完《异秉》，他沉浸式地进入了回忆，经不起朋友们再一鼓励，《异秉》式的小说他就接着写了。汪先生特意提到一个问题，他说他的写作在很多人看来不合时宜。因为80年代初的中国百废待兴，整个中国都处在一种昂

汪先生说得好，回到民族传统，同时不拒绝国外文学的影响；回到现实主义，但是不拒绝现代主义。把传统的和现代的、本土的和国外的融合起来，最终形成我们自己的一个传统



扬的奋进、热火朝天的状态下，文学跟时代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，当时现实主义如日中天，这时候他反倒写出了跟当下生活散淡疏离的作品。当然，他自有其说法：《受戒》这个小说体现的不是《受戒》故事里那个时代的审美和对社会的认知，而是体现了那个80年代的中国人对那个时代的认知。这就涉及到我们写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作家应当以及如何通过文学的手段去重构他对历史的认知。

第二个原因，那段时间他的老师沈从文要出文集，作为学生，汪曾祺把老师的作品又重读了一遍，读的时候依然感受到沈从文作品里面三三、天天、翠翠那些年轻女孩的美好，他也想写出这样的人物，然后才有了小英子这个形象。汪曾祺说：“我是沈先生的学生。我曾问过自己：这篇小说像什么？我觉得，有点像《边城》。”我们比照小说最后明海和小英子的对话，再看看《边城》的结尾，会发现这两个小说的爱情/情感模式其实是一样的。可见，每个作家的写作里面都有大量的前文本和潜文本，所以读一本好书不仅仅是读这个作家的这本书，同时也是在吸收对他有所影响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共同的营养。

第三是受到当时“百花齐放”气氛的感召。汪曾祺说，这个小说如果放在“文革”十年，乃至放在整个十七年中他都不会写，只有在“百花齐放”的时代才能出现。他说他不仅要写，而且要写得很美、很健康、很有诗意。这三个词也是我们解读汪曾祺小说时最重要的几个关键词。他写的是美，是健康的人性，所以明海和小英子之间才会有那种天真烂漫的状态。

这三个原因是汪曾祺先生的夫子自道。我觉得还可以补充其他几个原因，比如汪先生创作背后的思想资源，即佛教和

老庄哲学对他的影响。如果沿着汪曾祺往上追，可以追溯到沈从文，继续追，可能一直会追到苏东坡、王维、陶渊明，等等。儒道释在他这里共同起作用，所以汪曾祺是一位既入世又出世的作家。还有一点，也是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，就是小说对地域性的呈现，既有点又有面、既有局部又有整体观。一个作家回到他和他的文化生长之地去挖掘人和现实、和历史之间的关系，这也是那个时代拉美文学爆炸对中国文学带来的启发。

对我们今天来说，汪曾祺的创作有几个问题需要特别关注。一是他的短篇小说美学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，只写短篇小说且蔚然卓著者，可能就两位，一位是鲁迅，另一位就是汪曾祺。汪曾祺在自述中说，他只会写短篇，或者说他只熟悉这样一种思维方式。一个人是写短篇、写中篇还是写长篇，受制于他的思维模式，写短篇的时候有短篇思维，写中篇的时候有中篇思维，而写长篇则是长篇思维。我写完长篇小说《耶路撒冷》，有一段时间回头写短篇，怎么写都不对，开个头就觉得是长篇的表达方式，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都下不了笔。后来，我重新大规模读短篇，一点点找回短篇的感觉，重建了短篇思维后再写，才顺畅了。汪曾祺的小说都比较短，最长的《大淖记事》也只是一万七千字，有人说这个小说写得真好，不能把它拉长，变成一个中篇？汪曾祺一口拒绝，说这就是它该有的样子，如果拉长了就不是现在这个小说。他认为短篇就是短篇，不存在可以作为长篇的短篇，也不存在可以作为短篇的长篇。一个文体有一个文体的质的规定性，这是艺术规律，我们写作时不能乱来。

对汪曾祺小说深入追究后我们会发现，有几个概念纠缠



徐则臣

到了一块儿，比如乡土文学、现实主义、现代主义。汪先生一直不赞成自己的文学被称为乡土文学，因为当时流传一个观点，很多人习惯以乡土文学为借口去反对现代主义。汪曾祺说：“我认为我的作品是现实主义，但是我一点都不排斥现代主义，我认为我的作品里面现实主义中有现代主义。”他同时提到：“我主张回到现实主义，回到民族传统，但是我一点不排斥西方文学的影响，我希望我在写中国式的现实主义作品的时候，能够融入西方的一些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。”

汪曾祺在80年代后期开始写系列小说《聊斋新义》，这是汪曾祺对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部分作品的“重述”。大家都知道《聊斋志异》是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瑰宝，是古代中国短篇小说的集大成者，汪曾祺为什么要在晚年重述“聊斋”？这其中蕴藏着他对传统的想法。汪曾祺在晚年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文学传统的重要性，有一次他在座谈会上说，如果对新潮派的年轻作家说点意见，那就是要补两门课，一门课是古典文学的课，一门课是民间文学的课。这句话放在今天更加切要。在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，文学越来越趋同、越来越同质化的今天，如何让我们的文学成为我们自己的文学，让中国故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故事？汪先生说得好，回到民族传统，同时不拒绝国外文学的影响；回到现实主义，但是不拒绝现代主义。把传统的和现代的、本土的和国外的融合起来，最终形成我们自己的一个传统。这也是我在今天重读汪曾祺作品的时候，在作品本身的美、意蕴、作家修为等提醒之外，更为看重的一个启示。

(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“名家读经典”系列活动上的讲稿，整理：樊金凤、周倩羽)

■第一感受

叶子，仰望天空

——谈程绿叶散文诗集《最美的雪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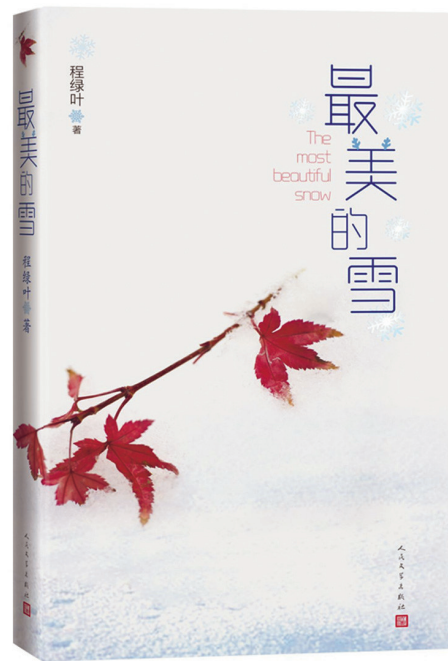
□许春樵

程绿叶《最美的雪》提供给我们一个诗的切入视角。从技术层面看，借景抒情、托物言志是传统的诗歌技法，而程绿叶的散文诗将传统技法和现代诗歌技术融会贯通，她写风、雨、夜晚、天空、河流、阳光、叶子、声音的时候已经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、感受，这种体验和感受实际上有时候是超验的，是隐喻的，是象征的，是异质化的，虽说的都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感受，但技术上的现代性非常明确，是中国式的抒情，但又超越了中国式的传统。

举个例子，“遥远的风从北极赶来，吹灭一个人长夜的风，我依然相信小草正在春天发芽……”这是典型的诗性叙事，是中国传统叙事与西方现代叙事融合或叠加在一起了。这种融合和叠加，让散文诗里的情境不是我们通常讲的场景还原和复制，程绿叶笔下的场景是经过内心体验、经过情感过滤的，所以被赋予了新的色彩和意味，是现代感觉的合成。散文诗中，我们不能用传统的逻辑语言来要求，新批评理论认为文学语言是情感语言，不需要用语法来规范，所以程绿叶写槐树，“尖锐的刺是从幼小的身体里长出来的，腊梅幽香扑鼻，风是白色的”，这些都是内心情感过滤以后的直觉和隐喻，所以我觉得在叙事和呈现上，散文诗是有其独特的存在方式的。

程绿叶的散文诗是有独特性、辨识度和标签性的。女性写诗或者女性抒情，往往有着类似的审美取向，一看就知道是从女性敏感脆弱的内心流淌出来的，而程绿叶散文诗中的抒情和认知跟一般的女性完全不一样。有些女性的写作不仅敏感和脆弱，而且

是容易被伤害的，是容易塌陷的，她们往往是在生命的磨难中坍塌、受伤、幽怨。而程绿叶不同，我从她的散文诗集中读到一种“刚性”的东西，我用“刚性”提炼她散文诗的内涵，是因为刚性和柔性相反相成，女性的柔美在程绿叶的散文诗中表现为刚强和坚毅，她的散文诗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抒情和唯美的审美趣味，她的散文诗里对人生、社会、情感的深度思考和探索，有哲思也有一些禅意在里面，所以就累积成了形而上的理性认知，哲思和禅意是建立在理性上的，而不是感性上的，她的散文诗对刚性的刚性与力量在书中是有整体性体现的。书中虽然也写到很多人生的不如意和挫折，但程绿叶的散文诗的基本姿态是敢于直面人生的惨淡，勇于面对世事的无常，写感情而不纠结于情感，寒冷中不忘坚持，温暖中牢记感恩，这些情感贯穿了整个篇章，所以，她的散文诗在刚强、坚定中还流露着通透和潇洒，我觉得这是一般女性写作很难做到的。女性更容易“小我”，程绿叶却说“向下需要勇气，基因里的勇敢和信念让我携着热爱……”《最美的雪》这本书里有很多叶子的意象，叶子带有作者的自我隐喻，书中的叶子始终是向着天空，“向上”这个姿势也是作者人生的姿势，是对人生和命运的隐喻，代表着一种自我的向上和自我的增长，是在不断挑战生活的压迫，挣脱生活中的种种磨难。这就让程绿叶的诗中有一种坚强、笃定、正念、向上，而不是沉沦、向下和绝望。这是她的散文诗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也许跟她的经历有关。她是军人的后代，个人生活中也遇到过



《最美的雪》，程绿叶著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22年10月

磨难，但她始终不向下、不屈服，她生活的态度自然就演化为她写作的态度，她想用散文诗来表达对生活的理解，以及对情感、人生、命运的态度和立场。写作是作家用自己的文字向社会、人生表态，程绿叶独立而独特的人生态度，构成了她写作的方向和路径。

此外，程绿叶的文字很干净，她的修辞没有做作的地方，没有雕琢粉饰的痕迹。《最美的雪》中的散文诗显示出她扎实的语言功底，她的文字有着强大的穿透力和感染力。程绿叶的修辞是为了离自己的内心更近，我想这取决于她对人生的态度、情感的立场和对命运的透彻理解和把握，所以，她的散文诗拥有直指人心的力量，同时让读者体验到离心灵很近的阅读感受。

(作者系安徽省作家协会主席)

■短评

用文学捍卫精神的高贵

□刘宏志

在社会物质财富剧增的今天，我们如何处理某些道德难题，如何安放自己的灵魂？赵文辉用他的系列小说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。在赵文辉近年来创作的小说中，作家借助餐饮业这个独特的视角，展现了市井人间驳杂丰富的生活样态，同时表达了他对这个时代精神的认知和关切。

赵文辉餐饮业系列小说关注的重心是人的道德问题。短篇小说《喝汤记》是一篇篇幅不长但颇为精致的小说，小说围绕饭店中的一个场景展开描写，“地包天”等几个无赖在饭店吃饭，饭店的馒头因为发酵粉没有揉开而出现了黑点，于是，这几个人便以此向饭店索赔。这场闹剧最终因为另外一位客人杜医生出面主持公道而不了了之，但是小说却将几个无赖步步紧逼、饭店老板委曲求全的紧张感写得栩栩如生。小说结尾，曾开过饭店的“我”妻子在高度紧张中不自觉地身份代入，主动替老板娘招呼客人，这个细节在增加小说趣味性的同时，更呈现了鲜明的道德立场。这种道德对立的结构模式，是赵文辉这一系列小说常用的情节冲突，如《崖上》中诚信经营的老根子与坑蒙拐骗的亮子的对立，《沉默的传菜生》中的老笨叔与艳红、徐小胖等人的对立，《我们的老板》中艳菊、老笨叔与徐小胖的对立，等等。在这个二元对立的结构中，作者塑造了一系列反面人物形象：如“地包天”“绵羊鼻”“坑王”（《喝汤记》）、金小妹（《沉默的传菜生》）、烟熏嗓（《一场搞砸了的婚宴》）、艳红（《沉默的传菜生》）、饭店老板亮子（《崖上》）、田丽丽（《小菜一碟》）等等。他们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，只追求功利的人生目标，为了达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，无视道德、无视群体利益。作家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刻画和嘲讽，表达了对工具理性价值观的反思和批判。

在这种冲突中，作家也表明了自己的价值指向。《喝汤记》中的“我”和妻子，是无法应付各种关系而不得不放弃饭店经营的失败者，但

是，在看到别的饭店经营者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们不是幸灾乐祸或者隔岸观火，而是感同身受地为饭店老板焦虑，本来可以袖手旁观的杜医生也仗义执言，帮助饭店老板渡过难关。在人生的关键时刻，他们都能呈现出人性中最可贵的一面，从而给读者带来希望。此外，《沉默的传菜生》中，少华的妈妈无法挽救自己的生活，也没有能力挽救自己的儿子，但是却坚持做义工帮助别人，老笨叔被妻子、女儿嫌弃，却不顾自身利益，挽救了少华的生命；《一场搞砸了的婚宴》中的付青山经济困难，妻子残疾，给儿子办婚事的时候，因为饭店方面出现问题导致婚宴受到一定影响，有要求饭店赔付的理由，但坚持给饭店付了全款；《我们的老板》中的路大国经营困难，却对员工非常友善，而员工艳菊和老笨叔在路大国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竭尽所能地保护了路大国的饭店；《小菜一碟》中的大伟和艳菊，即便自己经营的饭店破产，也要坚持还清所有人的欠款再离开；《崖上》中的根子，因为坚持诚信经营，导致自家饭店的顾客不断被人抢走，但却始终坚持笨拙的经营方式。仔细分析这些“失败者”形象，我们发现，诚信、知恩图报、对周边的人报以善意的关爱是这类人的基本特征。这类形象其实是对利己主义的一种反驳。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他们都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精神和道德底线，虽然这种坚守让他们显得有些愚笨、悲壮，但是，也正是在对这些人的愚笨和悲壮的书写中，凸显出了人类精神的希望所在。

在工具理性甚嚣尘上的时代，文学应该成为捍卫人类精神高贵的最重要的防线。但现实是，很多文学已经在忙着吟咏成功者的赞歌，而忽略了人类精神的健康。从这个意义上，赵文辉的餐饮业系列小说有着重要的意义，他指出了这个时代人的精神生态问题，强调着人类道德的价值。他以自己的文学，捍卫着人类精神的高贵。

(作者系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)